

以城市作畫布：柏林街頭塗鴉的精神

張綺庭

前言

在學習德文的過程中，曾接觸到一篇題目，大致上是針對「塗鴉」做論點討論，這個題目可稱得上令我印象深刻的討論議題之一。其中的論點從意見表達作切入「牆壁就一直被用作交流的場所。想想石器時代的洞穴壁畫就知道了，而在古典古代，人們也在牆上刻畫訊息或圖畫」、到文化層面的探討「在大城市的某些街區，塗鴉是形象和文化特徵的一部分。許多年輕人找到了自由發揮創意的途徑，有些人甚至透過裝飾建築物來賺錢」，甚至關於其危險性「塗鴉藝術家經常在冒險的地方工作，其風險不容小覷」等都納入討論。其面向之廣絕非「塗鴉影響市容觀瞻」能一概而論。

然而，塗鴉之餘城市發展的份量那時我還無法想像，直至我親身走訪柏林。

塗鴉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被視為現代塗鴉發展的重要時間點，其

中以德國國會大廈內部牆上的軍官塗鴉為典型的例子（圖一）。在 1960 年代末期，美國塗鴉逐漸成為反映社會的次文化。塗鴉最初是青少年在建築物出入口、地鐵車廂、牆上等地方標上自己的綽號，隨後越來越多人模仿這樣的行為。而為了因應日漸激烈的標籤塗鴉競爭，這些標記也逐漸從奇異筆改為表現力更強的噴漆罐。噴漆罐使得呈現上能有更複雜更大面積的圖像，自此也開始更多不同風格的塗鴉。

1983 年，一部紀錄美國嘻哈文化的電影《Wild Style》在歐洲上映。上映之後人們對於塗鴉的文化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而塗鴉文化也在此時期的柏林傳播開來，開始有了第一批的標籤塗鴉。而在柏林歷史上還有一個重要的時間點對於塗鴉的發展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圖一：保存於德國國會大廈的士兵塗鴉。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圍牆倒塌後的牆面成為了塗鴉的絕佳地點，再加上當時柏林地位混亂，法律規範也尚不明確，在不須承擔太多責任的情況下吸引了不少塗鴉者前往創作。一系列針對市容風格改變的相關報導也使塗鴉更廣為人知，奠定了其日後在柏林的發展。

時至今日，柏林的街頭塗鴉已相當興盛，不僅有專門的藝術館邀請藝術家駐村創作回應社會議題，也嘗試讓原先存在於公共場域的藝術模式進入博物館。而對於未來的發展，相關藝術館也提供獎學金培養藝術家，使他們能專心創作。柏林的塗鴉能相較於其他城市更蓬勃發展絕非偶然，與歷史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對於藝術家相對友善的環境，都造就了今日柏林街頭上隨處可見的街頭塗鴉。儘管有質疑的聲音表示，塗鴉的精神在進入美術機構的同時就不復存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透過展出拉近與大眾之間的關係也能讓民眾重新認識塗鴉所傳遞的意涵。畢竟柏林街頭塗鴉有歷史發展背景做支撐，已然存在幾十年的塗鴉行為是無法輕易被抹除或由其他大眾美學形式所取代。與其嚴格消滅塗鴉及其所產生的反抗意識，改變人們對街頭塗鴉的態度，也許更能讓塗鴉成為柏林不可或缺的元素。

訴說歷史的塗鴉

在參訪德國國會大廈時，很難不注意到那些與修建過後的建築風格不一的牆上塗鴉。那些牆上的歷史印記是來自1945年的訊息，

跨越了幾十年的時間傳達了紅軍士兵當時擊敗希特勒的喜悅。對他們來說，國會大廈是他們戰勝希特勒德國的象徵。在國會大廈的牆上，士兵們用彩色蠟筆或炭筆寫下自己的名字和來自哪裡，象徵性地佔有了這棟大樓。那些塗鴉是他們自我肯定的印記，標誌著他們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事實。儘管大多數的塗鴉僅簡單揭示著作畫者的基本資訊：「…曾經在此」，並加上日期或士兵家鄉或地區名稱、軍銜、部隊名稱等，仍有些字樣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辱罵，也因此塗鴉在國會大廈的存在是否是必要的、保留能為後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等等問題在當時都經歷過不少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事情發生過後的幾十年後，偶有當時塗鴉創作者與現在參訪者產生連結的時刻。來自亞塞拜然的學生阿納爾-納亞福夫（Anar Nayafov）在聯邦議院的一名議員處實習時，發現了一幅由其祖父馬梅德·納亞福夫（Mamed Nayafov）書寫的塗鴉。還有一位導遊分享的類似經歷：「一群來自當時斯大林格勒的退伍軍人的妻子們檢查了塗鴉。參觀結束後，團裡的一位老婦人走過來告訴我，她去世的丈夫說他來過這裡，還在這裡留下了不朽的文字。當這位老婦人最終站在她丈夫的書面證詞前時，淚流滿面。」相關故事並非少數，揭示著跨越時空的對話。

戰後蘇聯軍隊在德國國會大廈上留下的塗鴉，事實上因內部的損壞大多被鑲板覆蓋住而經歷了一段被遺忘的時期。在兩德統一

後德國政府開始著手修復國會大廈，在揭開鑲板的同時也揭開了深藏在建築內的歷史。這些塗鴉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也是反思過去的重要畫作。它們使歷史栩栩如生，並將重大事件的記錄傳遞給無數拜訪者，建立了相當深刻的連結。

另外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塗鴉是現今仍為熱門景點的東邊畫廊。全長達 1.3 公里的東邊畫廊曾經是象徵鐵幕的灰色牆，在圍牆倒塌後則被改造成世界上最長的露天畫廊。藝術家們透過富有創意的壁畫，將分離時代的遺跡轉變為表達自由的多彩紀念碑。其中最著名的畫作不外乎是弗魯貝爾的《兄弟之吻》，畫中呈現了東德最後領導人何內克及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嘴對嘴擁抱。從遠處望去就能知道其畫作位置，因為他總是排滿等待拍照的人潮。直到今天，它們作為照片和明信片的圖案仍然非常受歡迎，甚至有賣咖哩香腸的店家使用這張圖作為商品的宣傳



圖三：
凝視著
路人的
街頭塗
鴉。

(圖二)。有趣的是，在所謂畫廊的塗鴉畫作上，往往還能看到不少後來才添加上去的塗鴉或標記。沒有純粹乾淨的畫作，只有層層堆疊的塗鴉精神。

實地走訪柏林街頭後

塗鴉作為柏林街頭藝術的代表，其密度之高遠遠超乎我所預期。除了上述提到的東邊畫廊牆上的塗鴉，路上也有不少塗鴉畫作能讓人欣賞。我特別喜歡那些著重於臉部描繪的塗鴉。看著那些被放大的表情，彷彿能從眼神和他們對話(圖三)。不是每個塗鴉我都能領略創作者想表達的意涵，但塗鴉數量之多讓人無法忽略其背後所要傳

圖二：以《兄弟之吻》作為咖哩香腸宣傳圖。



圖四：佈滿貼紙的交通號誌。

遞的精神。有人稱這樣的精神為屬於柏林的反叛精神，宣洩出對社會不滿。我則認為，作畫者有認為這樣的精神能被社會接納的自信更令我著迷。除了遍地綻放的塗鴉外，街頭上常見的街頭藝術還包括了各式各樣的貼紙。貼紙出現的時機總是讓人意想不到，從建築物的牆上、交通號誌再到各式交通標誌，無論何處都有機會見到小驚喜（圖四）。漫步在柏林街道上，總會忍不住駐足欣賞那些街頭藝術家的小巧思。另外，以大量海報為街道注入活力的場景也時常於柏林出現，那些抵擋不住時間重量而垂落的厚厚海報標誌著多元並存的痕跡（圖五）。

圖五：無數海報堆疊而成的牆。



塗鴉的本質是自由嗎？

在參訪柏林大小景點的過程中，我也曾經對於塗鴉的自由是否有其上限感到質疑。在參訪柏林大教堂時，我曾看到樓梯間充滿著肆意標記的名字及社群帳號，也曾在普魯士解放戰爭國家紀念碑見到許多塗鴉的痕跡（圖六），對於塗鴉是否該有限制，若有又該限制到何種程度，目前我也沒有明確的概念。對於歷史建築開始有了現代塗鴉的痕跡心中不免有些排斥，但車站內的塗鴉又似乎可以接受？在世界各地也存在著許多以牆上的塗鴉傳達強烈理念的案例，例如位於捷克首都的藍儂牆（圖七）。那些批判當局象徵抗爭的塗鴉牆面在塗鴉世界裡是不是又比隨處可見的街頭塗鴉更有份量？難道只有這些有影響力的塗鴉才能被認可為「好」塗鴉嗎？不過一旦牽扯到價值判斷，塗鴉本身似乎也失去它所代表的精神了。

就像在討論言論自由的適用範圍一樣，塗鴉究竟被賦予的自由表現可以到何種程度仍



圖六：遭塗鴉之普魯士解放戰爭國家紀念碑。

要回歸到大家對特定價值觀的接受度。塗鴉本身是一種表達想法的形式，就如同其他任何一種表達方式不會有絕對的好與壞。在有人認為塗鴉展現了多元包容聲音的同時，也有人會因此感覺到被冒犯；在有人對於能在任何一處發聲而感到自由時，也同時有人為要善後清理感到憤怒。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行為確實為柏林居民及拜訪者帶來更多的對話空間。

後記

結束柏林的旅程後我向住在柏林的朋友分享柏林街頭藝術所帶給我的深刻印象，他驕傲地回答我：「沒錯，那就是屬於我們柏林

的特色！」那個對街頭塗鴉產生的認同令我難忘。

參考資料

張詠翔(2019)。柏林的塗鴉探討 — 從政治、社會、文化與藝術的角度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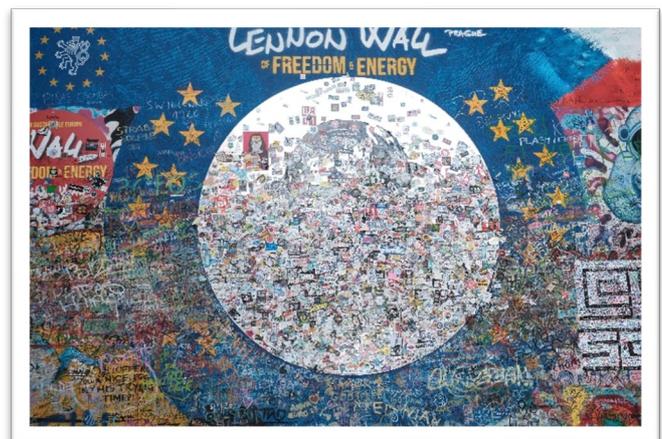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7/the-graffiti-that-made-germany-better/373872/>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690546/db3ebac5ef9497919c8ebb76dee1dff9/flyer_graffiti_en-data.pdf

<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1910050017.aspx>

<https://artemperor.tw/focus/2909>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圖七：捷克藍儂牆。